

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

荣新江主讲 乌心怡 编辑整理

听荣新江先生《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的讲座，受益匪浅。荣新江先生通过大量并且是非常珍贵的图像资料，把我们带进了中古时代。通过图像部分展现历史，这不仅只局限在历史文献的范围里，还把我们领进了考古、文物和艺术里来。使我们可以综合地考察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这一领域。通过语言文字、通过出土的文物等来了解古代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因为这些资料都反映着他们本民族的历史，而不是古代的史官所写的。所以通过这些图像可以真实的反映古代丝绸之路上的历史文化。

一、丝绸之路的基本走向

汉代丝绸之路的基本走向：东面始于西汉的首都长安（今西安）或东汉的首都洛阳，经咸阳，一条路沿泾河而上，经固原进入河西走廊；另一条路沿渭水西行，经金城（今兰州）进入走廊。经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出玉门关。汉代要先到楼兰。而汉代西域分南、北两道，这两道的分岔点就在楼兰。北道经焉耆、龟兹（今库车），到疏勒（今喀什）；南道自鄯善（今若羌），经于阗（今和田）等地到疏勒。通过塔里木盆地的南北两道，翻过帕米尔高原，经过现在的喀布尔，下到白沙瓦，这条路是到南亚，也可一直到伊朗。另一条正是从粟特地区的撒马尔罕、布哈拉，经过伊朗、伊拉克再到叙利亚，然后到地中海，再到罗马帝国。所以中国古代距离西方最近的路就是通过河西走廊，通过塔里木盆地，翻越帕米尔高原，然后到阿富汗或巴基斯坦出去。

隋唐时期，丝绸之路有三条路线。北道从哈密越过天山，沿草原西行，经过突厥等游牧民族地区，一直到东罗马。中道从吐鲁番西行，经焉耆、龟兹等地，翻过葱岭，进入粟特地区，到波斯，最后到地中海沿岸。南道从鄯善到于阗等地，过吐火罗地区（阿富汗）进入印度。随着地理环境的变化和政治、宗教形式的演变，不断有一些新的道路被开通，也有一些道路的走向有所变化，甚至废弃。

二、丝绸之路的民族

在这这么一条重要的道路上，一方面生活着各种各样的民族，另外也是一个东往西来的道路。从考古发现和中国历史的典籍记载，过去塔里木盆地的主体民族是印欧种，是深目高鼻、蓝眼睛、红头发的民族，特别是北边的吐火罗和月氏民族，南边的塞和斯基泰民族，由于民族的同化，使得中亚的很多主体民族变成了突厥民族。现在的伊朗民族，就是塞人传下来的。占据河西走廊的月氏民族，是一个游牧民族，实际上它是东西交往的一个承载者。

甘肃灵台发现的一个戟。戟的头部有一个与中国古代的人不一样的人的头像，是西周

时期的青铜器。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出土文物，是难得的一个白种人的形象，是非常典型的吐火罗或月氏人。

粟特地区处于中亚西部丝绸之路的干线上，粟特民族是中世纪东西方贸易的承担者。粟特人大部分居民来自康、安、曹、石、米、罗、何、贺、史国的中亚昭武九姓王国。他们是一种城邦国家，七世纪以后大量的粟特人成群结队到唐朝来做生意。并推举出商主“萨宝”（队商首领的意思）。形成了一种胡人聚落。粟特人为了做生意，经常接触其他民族，因此粟特人懂得多种语言。粟特人不仅是中国和粟特地区，还是和北方民族，和印度的贸易承载者。另外粟特人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粟特人人高马大，满脸胡须，非常漂亮，与唐朝人不同，他们还会打猎，因此在唐朝的宫廷里很受欢迎。

宁夏盐池县发现的粟特人的墓。在这个墓门上画着跳胡旋舞的粟特人。他穿着锦绣的衣，翻领紧口的胡服，然后踩在一个椭圆的毡垫上，旋转如飞的跳着胡旋舞。（见图 1）



图 1：宁夏盐池 M6 号墓石门上的胡旋舞形象 耳其，中国的匈奴人到了匈牙利，当然中间夹杂着很多民族，他们的主体民族大都是从中国过去的，当然中国的汉族也吸收了粟特人，吸收了匈奴人，吸收了突厥人，吸收了各式各样的民族。成了我们今天这样一个大的汉族。

三、丝绸之路的语言文字

古代的焉耆、龟兹和吐鲁番盆地从 3 世纪到 10 世纪流行着一种语言，刚发现时是一种不知道名字的语言，是一种死语言，后来慢慢才知道是吐火罗语。所谓印欧语系下面有两支，一是现在的日耳曼语、英语、法语、西班牙语；另外一支就是印度伊朗语。吐火罗语属于印欧语的西支，而在和田、粟特发现的印欧语属印欧语的东支。吐火罗语的发现对于世界的语言学史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吐火罗语的价值也是非常大的，因为它是死语言，没有受到后来的干扰，它保留了原有中古时代的状态。在吐鲁番盆地到焉耆到库车流行着两

种吐火罗语，一种是吐火罗语 A，一种是吐火罗语 B，吐火罗语 A 完全记录佛典，并且很少见，曾发现过一件《弥勒会见记》剧本，流行于焉耆。吐火罗语 B 基本上是世俗文书，也有佛典，流行于龟兹。这些语言对我们研究丝绸之路上的往来和文化交流是最重要的一种资料。吐火罗语和和阗语都是用的印度婆罗迷字母。这种文字刚在塔里木盆地挖掘出来的时候，根本看不懂这种语言，因此把它转写成拉丁字母，但是拆不开一个一个的词，这种语言是属于伊朗系统的语言，这些语言也是经过多年的解读，才真正的读通。除了吐火罗语，另外就是从印度传来的语言，最早进入中国的是梵文的俗语，它搀杂着口语的梵文语言，这种语言最早是用佉卢文来拼写的，以后用一种婆罗迷字母拼写，所以这种佉卢文拼写的梵文俗语应该是最早进入中国的佛教典籍。

图 2：懿德太子墓发现的文物



和田发现的公元 2 世纪的在一个桦树皮上写的经，是一个佉卢文的《法句经》，《法句经》在早期中亚的佛教典籍里占着很大的比重。另外最早的那种佉卢文在东汉魏晋时期的和田一直行用。比如：钱币，一面是汉文“五铢”，另一面就是佉卢文。他可以在汉人与西方来的商人之间交换。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见证，反映中亚的多种文化交流。粟特人也是同样把钱币做成两面可用的文字，一面是按照开元通宝做的，另一面是粟特文。

除了印度语流行在塔里木盆地的南北，两沿都有伊朗语，在巴楚盆地发现的图木舒克语，属于东伊朗语，是先突厥时代的语言，历史名称应该叫“据史德语”。这种语言现存只有 14 件文书。

那么在中国境内和田范围里发现的更多的东伊朗语就是于阗文。

敦煌藏经洞保留的完整的于阗语贝叶经，中间有一个穿孔，可以穿一根绳，佛经可以翻着看。另外它也是官方语言，如在和田发现的买卖奴隶的契约。

除了在塔里木盆地居住的这种印欧语系的民族留下的文献，丝绸之路上也有很多外来民族的文献。象中古波斯文、叙利亚文；另外丝绸之路上传来的更西方的语言，就是希腊文，当然是一种希腊文的变体。

青海都兰发现的丝织品，上面有非常清楚的中古波斯文。

固原南部的隋唐墓葬里发现的蓝宝石，上面有 3 个连续的美术字“丰饶”就是中古波斯文。

西安西部土门村 50 年代发现的墓志，墓主人是一个在神策军里当兵马使的一个人的夫人，叫苏谅妻马氏。她完全是从波斯来的一个王族后裔。上面是中古波斯文，下面是汉文。

甘肃竟远发现的一个鎏金的银盘，中间是一个少年骑着一头狮子，外面一圈是希腊奥林匹斯山的十二神，底座上有不规则的巴克特里亚语。是一种伊朗语。

其实，我们中国的文字也不只是在中国本土里用，它也是向西方传播的。

在尼雅发现的一个墓里，有一块袖标，上面写着“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这可能是尼雅的精绝国的国王，为了配合东汉到魏晋时候跟羌族打仗所佩带的一个袖标。

在吐鲁番文书里，有一个案卷，是一个住在长安的汉人与一个住在长安的粟特人，一起去做生意，由于互相借贷，产生纠纷，到安西督护府去告状。这个就证明我们汉人也是非常勇敢地出去做生意。

四、宗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隋唐时期，由于国家开放，勇于接受新鲜事物，虽然儒释道三教仍然占据着思想领域的主导地位，但流行于西亚的祆教、摩尼教、景教也广泛的传入中国，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影响。

在敦煌长城烽燧下发现的粟特文古信札里，可以确证祆教早在公元4世纪初就由粟特人带到了中国。

摩尼教本是产生于古代波斯的一种宗教，在波斯受到镇压，几乎绝迹，但却在中国，特别是中国的维吾尔先民回鹘人中间广为传播。摩尼教很讲究书法，摩尼教的卷子都是非常漂亮的。

关于景教的历史记录，以西安碑林《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最为重要。景教也就是基督教，在唐太宗贞观九年（635）就传入中国，而且被允许在长安城的西北角建了一个庙。（见图3）

精神文化的传播跟宗教有很大的关系，由于中国人不信宗教，所以中国的思想文化至少在古代没有传出去，一直被我们作为优良的传统文化不断的继承下来。然而在物质文化方面，中国贡献给了世界丝绸、茶叶、瓷器等等，如今在世界哪一个国家不用瓷器，有很多欧美国家的人，上午喝咖啡，下午必喝茶。中国出口的大多是大众商品，所以中国对世界的贡献是非常大的。虽然中国也进口了很多外国的金、银、香料、胡椒、樟脑等物品，从古到今中国不知进口了多少香料，但这对于中国的老百姓来说几乎都是奢侈品，只有唐朝的皇帝、汉朝的皇帝以及那些贵族富商才用得起。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我们应当思考一下古代交流当中对中国并非有利的方面，吸收外来的好的方面，实际是为了在改革开放的时代来促进我们更好地交流。当然我们还要继续为世界做贡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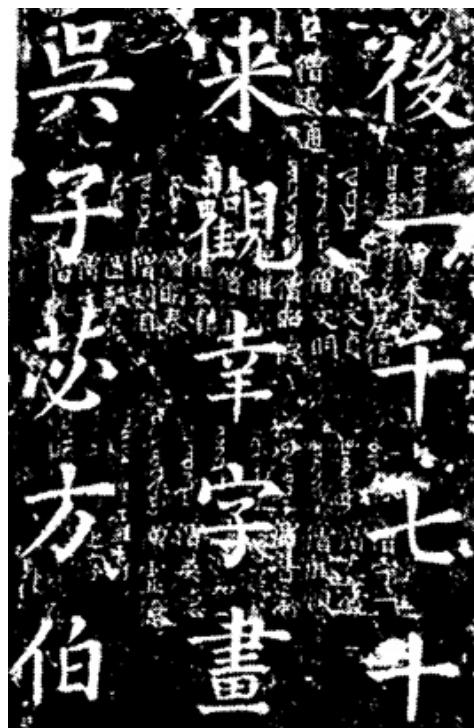


图 3：《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上的波斯人李素题名